



博雅语言学书系

Towards a New Approach
to Constructing a Country-Specific Word List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国别化”

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研究

甘瑞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博雅语言学书系

Towards a New Approach
to Constructing a Country-Specific Word List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国别化”

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研究

甘瑞璈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研究/甘瑞瑗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
(博雅语言学书系)

ISBN 978-7-301-11263-2

I. 国… II. 甘… III. 对外汉语教学—词表—研究 IV. 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3474 号

书 名: “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研究

著作责任者: 甘瑞瑗 著

责任编辑: 沈 岚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1263-2/H·1707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zpup@pup.pku.edu.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8

出版部 62754962

印 刷 者: 河北三河新世纪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30 毫米×980 毫米 16 开本 23 印张 400 千字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7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fd@pup.pku.edu.cn

序一

韩国甘瑞瑗博士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的研究课题是“‘国别化’对韩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研究”，导师是张普教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研究》一书，就是甘瑞瑗博士在她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这虽是甘瑞瑗博士的处女作，但在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领域里则是一部创新之作。“国别化”汉语教学的理念前人早已有之，并不始于本书（前人的提法一般是“要注意/针对不同母语语区的特点开展汉语教学”）。本书的创新之处就在于将汉语教学“国别化”的观点升华为理论——第一次真正从理论上，具体说从认知科学、“中介语”理论、教育学、外语教学、社会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多个角度，对“国别化”汉语教学进行了充分的、有说服力的论述，论说了“国别化”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国别化”的理论基础。

关于“国别化”汉语教学，甘瑞瑗博士在书中是这样说的，“所谓国别化的对外汉语教学，简单地说，就是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而进行的汉语教学”；唯有这样，“才能真正满足对外汉语教学的针对性原则”，“才能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成功率”。她的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甘瑞瑗博士只重点研究了对韩汉语词汇教学的“国别化”问题。她选择词汇方面来谈，是有道理的。我们知道，外语教学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一）为了更好地运用语言进行跨民族、跨国家的交际；（二）为了更好地运用语言认识、体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三）为了更好地运用语言学习、掌握各种学科知识；（四）为了更好地运用语言通过比较了解不同民族在语言、文化上的共性和特点；（五）为了更好地运用语言在国内外能较自由地与他人沟通。汉语作为外语教学必须考虑上述外语教学的目的。1999年8月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上，我在大会发言里曾强调指出，“对外汉语教学的总的指导思想是，怎么让一个从未学过汉语的外国留学生在最短的时间内能最快最好地学习、掌握好汉语”。怎样有效地进行汉语教学呢？怎样使汉语教学收到预期的效果，达到预期的目的呢？当然，对一个学习汉语的外国学生来说，汉语语音、汉语语法和汉字等方面的学习都是很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抓词汇学习，要掌握大量的词汇，要有足够的词汇量。掌握的词汇量越大，用汉语进行听说读写的自由度也就越大。换句话说，作为外语的汉语教学必须重视并抓好词汇教学。词汇教学，应属于汉语教学中的重点教学内容，特别在初级阶段。甘瑞瑗博士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所以她首先开展制定“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的研究。

对于如何研究、制定“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甘瑞瑗博士提出了“总体建构模

块”，并且在具体研究、分析汉语词汇情况和韩语词汇情况的基础上，具体提出了一份体现“国别化”的“对韩汉语教学用词表”总表。总表的词语包括四部分词语——汉语最基本的常用词语、韩语特色词语、汉语流行词语和韩语流行词语。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将韩语特色词语、汉语流行词语和韩语流行词语列入对韩汉语教学用词表之中。这是创举。这就告诉我们，作为国别化的汉语教学用词表，应以汉语基本词语为主，同时应包括一定数量的他国特色词语和汉语的、他国的流行词语。甘瑞瑗博士那“国别化”的观点和理论，无疑具有普遍意义，不仅适用于汉语词汇，也将适用于汉语语音、汉语语法等方面。

无论从应用语言学的角度说，也无论从教育学的角度说，也无论从人治心理学的角度说，作为外语的汉语教学，本身就是一门科学。作为科学，来不得半点虚夸和浮躁。甘瑞瑗博士对“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研究，是踏踏实实的。读者可以从书中了解到，作者在研究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有关文献资料，作了多方面的问卷调查，进行了各种统计分析。当然，该书肯定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与不足，但我想这不值得诧异。应该看到，研究并具体制定国别化汉语教学用词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甘瑞瑗博士完全清楚这一点，而且她也毫不掩饰自己研究中所存在的和现在已经觉察到的问题。在该书第七章里，她把自己研究和论述中遇到和存在的问题和盘托出。这些问题主要是，词表分级的问题、词性标注的问题、词语（包括汉语词语和韩语词语）筛选的权威性和代表性问题以及汉字的注释问题等。这就充分体现了甘瑞瑗博士实事求是的研究学风，同时也有利于人们在该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进行探索。

任何论著都贵在创新，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论著也不例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研究》的问世，以它独有的特色填补了作为第二语言的汉语教学的基础研究方面的空白。我相信，这部书一定会受到海内外汉语教学的老师、学生以及有关指导机构的欢迎和重视。是为序。

陆俭明

2006年6月30日

于北京大学

序二

瑞瑗希望我为她的书写一篇序，我非常高兴地同意了。能为她的书作序，是我的荣幸。

我常常对我的学生说：“博士论文不是拿到博士文凭和学位的终点，而是你们的人生和事业的新起点。”本书正是瑞瑗的博士论文，本书出版之际，她已经在她的人生和事业的新起点出发，迈向又一个高度了。

记得瑞瑗在她的博士论文最后部分致谢说：“我是一个有福的人，在我生命的过程中，总是有许多良善心谦的好人，用他们有力的双手支持着我。在韩国说这是‘人福’。是的，我是一个有‘人福’的人。”其实，我也是一个有福的人，尽管我做老师不一定优秀，但是，我总是幸运地得到优秀的学生。甘瑞瑗就是我得到的优秀学生之一。她是我培养的第三个外籍博士，也是我的学生中第一个在读博期间就晋升正教授的，更是为数有限的获准提前毕业的博士。

在她的感谢辞中，有一段是“感谢张普教授收容了我这个外来取经者。”对此，我要做几点说明：

首先，我哪里是“收容”？我几乎差一点就错过了接受瑞瑗这位优秀学生的机会。当北京外国语大学张洪波老师向我推荐说韩国的甘瑞瑗要报考我的博士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断然拒绝，说我不招外国留学生读博士。因为语言信息处理这个方向，需要语言学、计算机技术、认知科学、对外汉语教学等多种学科的交叉知识结构，外国学生读硕士还勉强，而博士生的研究是要求必须有创新的，这对于母语不是汉语的外国学生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张洪波说：“您先别拒绝，可不可以给我两分钟听我简单介绍她的情况，然后您再表态。”瑞瑗的确有‘人福’，由于洪波的坚持，这两分钟，改变了她“生命过程”的轨迹，也使我有幸得到了这样令我骄傲的学生。所以人不可以太主观，要善于倾听，予人机会，才能予己机会。

其次，她哪里是“外来的”？瑞瑗出生在台湾，1981年她本科毕业于台湾东吴大学电子计算机系，留学美国十年，认识了她的韩国籍的丈夫，随夫到了韩国之后，仍不放弃作为职业妇女的拼搏奋斗，选择了汉语教学作为自己的事业，因此她又觉得有必要到北京语言大学来攻读博士学位。她在博士论文摘要的开头第一句就写到：“对外汉语教学现在是，将来也一直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事业。如何全面地、有效地展开这项事业，是值得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以及教师们努力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题。”这样的出身、经历和认识,说明她就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事业”中的一员,她绝对不是“外来的”,恰恰相反,是“内”来的。

再次,她哪里是“取经者”?她在美国获得了MBA(商学)、MIS(信息管理学)两个硕士学位,到韩国后从事汉语教学,她又攻读了第三个硕士学位——中国语言文学。基于十余年对外汉语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基于她已经具备的多学科交叉的知识结构,她提出了“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以韩国为例)的研究设想,我仅仅是支持了她的国别化的提法和思路。她的论文从选题到答辩都得到了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和其他答辩委员会的专家教授的首肯,陆老师称赞这“是一篇具有开创性的论文。”“理解和表达并重,并强调这两方面要充分发挥。这一教学理念贯穿在词表中,这一理念不仅对于对外汉语教学,而且对于整个外语教学来说都具有普遍指导意义。”我相信随着本书的问世,第一个“国别化”的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对韩汉语教学用词表”将会首先显现对韩国的汉语教学的指导作用,所以,她哪里只是一个“取经者”?她分明是一个希望独树一帜的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

我也常常和我的学生们讲:做研究,特别是做有创新性的博士课题研究,要具备“四气”,即:才气、灵气、志气、勇气。瑞瑗兼具四气。

她具有“才气”。我们仅看本书第二章“国别化”对韩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理论基础,就可知她的知识面:该章涵盖了“认知科学方面的研究”、“‘中介语’的研究”、“对外汉语教育学的研究”、“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韩语的语言结构”等。如前所述,她已经具备文、理、工三方面的知识结构,并取得了三个硕士学位,她还有长期在韩国从事汉语教学的经历。她还娴熟地掌握英语(不仅在美国学习工作了十余年,而且家庭日常生活用语就是英语),2002年,在学校没有找到合适人选的情况下,我大胆推荐了瑞瑗担任一门博士课程的教师,教授专业(计算语言学)英语口语,她也欣然同意了。她下载国际上计算语言学网站的最新论文,大家在课堂上用英语讨论,她的课得到大家的一致好评,同学们感到收获很大。一个博士研究生,在读博期间,给自己的同学开课,而且受到欢迎,这大概也是很少有的。她的才气当然也是无可否认的。

她还具有“灵气”。创新性的研究,只有才气是不够的,还需要有灵气。有灵气,方可融会贯通、事半功倍,方可有超乎寻常的奇思妙想。创新思维常常就是顿悟,在学科或知识的结合处、综合处、交叉处突然闪现智慧的火花,关键是你善于捕捉并生发开去。我们过去说“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就是指缺少实践、缺少灵气、缺少创造精神。“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研究这个思想火花一经闪现,她就抓住不放,从词表制定的原则、方法、理论、基础、构成模式,到汉韩两国语料的分析与筛选、词语表的“词”的界定与提取,无处不透着她的灵气,比如:就语料库而言,她就不是仅仅了解和综述国内外有关“语料”、“语料库”、“语料库语言学”的理论基础研究,而是紧扣住中韩两国语料库的最新

权威成果进行筛选,又敏感地利用动态语言知识更新的前沿成果加入教学词表,为国别化的词表制定服务。这样她才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完成以韩国为例的国别化词表研究,并建立一个进行国别化研究的平台,从方法论的角度奠定国别化的第二语言教学研究的基础。

我在和瑞瑗谈话时,常常觉得她一点就通。但她的灵气不仅仅于此,更重要的表现是她善于理智地、逻辑地、严密地进行实施与整合,在我们第一次正式讨论她的博士论文可不可以开题时,她就向我报告她的研究共有 20 个步骤,现在已经进行了 11 步……这就不仅仅是一般的聪颖了,所展现的行动力令我暗中称许。

她更重要的是具有“志气”。有了才气、灵气,还必须要有志气,这样才能自主创新,度越前人。瑞瑗说:“二十一世纪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应该要朝一个更大的研究空间展开,更具有针对性、实用性和系统性。”还说:“在中国和平崛起,汉语热持续升温的大趋势下,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应该与时俱进,我们应该重新看待‘外’的所指,并对‘外’提出更精准的诠释与界定,将对‘外’汉语再推向一个新的高度。”有志气,就需要站得高,看得远。二十世纪,对外汉语教学完成了从经验型向科学的量化型教学的转化,我们有了《汉语水平考试大纲》、《汉语水平词汇和汉字等级大纲》等,二十一世纪我们还需要将粗放型的等级大纲推向精细化、精密化和精准化,即更加科学化、实用化。“国别化”是这个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重要方向,这个进程完成,就将结束把所有的外国人当作同一类型来教学汉语的状态。瑞瑗看到的就是这样“一个更大的研究空间”和“一个新的高度”。“志气”仅仅停留在站得高、看得远也是不够的,很容易变成好高骛远。路在脚下,“志气”还需要一点一滴地做、一步一步地走。瑞瑗说:“如何将对外汉语教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并将‘国别化’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落到实处,‘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的研究将是一条必经之路,更是我们从事对外汉语教学者当务之急的重要研究课题与任务。”不仅站得高、看得远,还能把研究“落到实处”,这就是瑞瑗的志气所在了。我也常常送给每个做研究的学生八个字——“高瞻远瞩,脚踏实地”,瑞瑗是真正地做到表率了。

最后是她还具备“勇气”。在才气、灵气、志气的基础上,创新最需要的是勇气,大智还须大勇,智勇要双全。她的勇气首先体现在她的研究中有许多在别人看来最好采取“回避”、“绕道”、“稳妥”、“保险”的方式来处理的问题或提法,甚至有人认为她的整个研究课题都可能受到质疑,是带有“风险性”的。比如:“国别化”的提法、教学“词”的界定、词表编制的表达和理解“双重(zhòng)”原则等等,万一有任何一点引起争议,都可能殃及博士论文的答辩。瑞瑗在经过认真思考和仔细调研后,仍然敢于执著地面对,但这并不等于盲目的冒险主义。她正面论述了所有需要论述的问题,因为她认定“对外汉语教学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培养学习者用汉语交际的能力,是现实的、实际的、活生生的、有绩效的交际活动”,她必须回答也自信能够回答这些问题。其次,她的勇气也表现在她不畏惧课题的难度和巨大工作量,她的前期的问卷调查、她的《HSK 大纲》和韩国语前 1000 高

频词的对比分析、她的中韩两国语料的提取与入库、她的韩国语料的转译、汉韩语料的对比等等,每一项的完成都何等的不容易,需要付出十分细致而又十分艰巨的辛劳。看看她论文后的[附录],共两百多页,就可知她的研究的艰辛,更不要说她只有一年脱产时间,主要靠执教的业余时间来完成,她的勇气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吗?

请读者注意读本书的最后一节“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的工作”,瑞瑗开列了5个方面的问题和4个方面的下一步工作。陆俭明老师说:“这种学风和求实的态度,值得提倡。”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严谨的、实事求是的,不可浮躁、不可急功近利,也不可好大喜功。相信瑞瑗能保持这种纯净的科学精神。

陆老师也是我的老师,我愿与瑞瑗共勉。

张 普

Abstract

Teaching Chinese to foreigners is, and will continue to be, a great undertaking fo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nation. In this regard, the discovery of methods to effectively promote and develop this undertaking using our inherent strength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ask which must be addressed. A vital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TCFL) has been the research conducted on the construction of a word list which can be used to teach Chinese to foreigners. The development of such a word list has a direct influence on matters such as: the writing of teaching materials; the compilation of dictionaries and reference books; the formulation of curricula and instruction syllabi for the teaching of vocabulary; the measurement and testing of the teaching itself.

The traditional way of building a word list attaches much importance to questions such as “What should we teach foreign students?” and “How should we teach foreign students?” while paying less attention to the question of “Who are we teaching?” Therefore, academic circles have tended to regard the Chinese corpus as the definitive vocabulary list. However, viewed from today’s vantage point, much of the data which has been collected is now antiquated. Furthermore, our own practical experience with teaching Chinese to foreigners has revealed that simply teaching foreign students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and present-day society is inadequate. Rather, students should also be taught how to express their own thoughts. Here, it must be recognized that foreign students have their own cognitive structures and schemata, and that these cognitive structures will affect their learning of Chinese. Moreover, most of these foreign students will, after having learned Chinese, return to their respective countries and engage in business, cultural, economic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that will require the use of Chinese. What’s more,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s not restricted to a particular zone or region; that is, it is not something that is conducted solely within China, but something which can be conducted at the global level. Therefore, it is essential that foreign students be able to express their thoughts and ideas in Chinese.

This research presents a new approach to the building of a word list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one which is grounded in a general view of human cognition. As we know, human cognitive processes are geared towards achieving the greatest possible cognitive effect while expending the smallest possible processing effort.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individuals must focus their attention on what appears to them to be the most relevant and important information available. The essence of communication lies in its two critical characteristics: “understanding”, and “expressing.”

Based on this fundamental notion, this research proposes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country-specific”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ountry-specific” is defined as “implementing different Chinese teaching curricula and methods for each individual country.”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unveils a methodology which clarifies the important conceptual distinction between “teaching Chinese” and “teaching Chinese to foreigners.” The theories behind this methodology are also discussed herein.

The question of “What is the role of words/vocabulary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is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Here we argue that in terms of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words” should possess two sets of characteristics: “significant adequacy” and “fluent adequacy.” “Significant adequacy” refers to an integrated unit with structural compactness and significant definitude. On the other hand, “fluent adequacy” refers to a cognitive unit with explicit phonetic form which conforms to the limits of humans’ working memory.

The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specific” TCFL which uses the corpus of the student’s mother country when constructing the word list will not only enhance the applicability of such a system, but also provide a valuable reference when it com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cessary theoretical foundation. Three corpora are employed in this research: *The Syllabus of the HSK Vocabulary and Hanzi* (《汉语水平词汇与汉字等级大纲》), Korean Frequency Corpus (KFC) and the Dynamic Circulating Corpus (DCC). Moreover, this research combines quantitative examination and qualitative investigation. The logical design of this research consists of four modules: typical Chinese words, typical Korean words, popular Chinese words as well as Korean feature and supplementary words. We believe that the use of such a modular design will not only simplify the manipulative procedure, but improve the function of updating the word list.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make the following contributions:

1. Present a new approach to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and apply this new approach towards constructing a word list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Koreans.
2. Define the term “country-specific”.
3. Define the meaning of the term “word” as it pertains to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4. Bring forward the idea that the building of a country-specific word list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should be based on both Chinese and the learner’s mother country corpora.
5. Advance the idea that Chinese and Korean experts and researchers in the field of teaching Chinese should be involved in the building of a country-specific word list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6. Build a word list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Koreans.
7. Promote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methodology for building a country-specific word list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Keywords: country-specific,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country-specific word list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as a foreign language, understanding, expressing, word list for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to Koreans

前 言

对外汉语教学现在是,将来也一直会是中国和中华民族的一项伟大事业。如何全面地、有效地展开这项事业,是值得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研究和教学的学者以及教师们努力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的拟定对对外汉语教学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直接影响到教材的编写、辞书的编撰和词汇教学大纲的制定与教学测试。

传统的“对外汉语教学词表”的拟定多只考虑到“该教外国学生什么”、“怎么教”的问题,着重汉语学习者对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理解,因此多只考虑汉语方面的语料,而且收集的语料也多是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的,今天看来有些词比较陈旧、过时,无法完全跟上时代发展的潮流。再说,教学实践表明只教会学生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是不够的,也必须教会他们如何用汉语将他们固有认知中的思维表达出来。我们必须认识到:第二语言也是交际的工具,并不是仅仅表达汉语或中国事物的工具。因为我们不能否定学生有其本身的母语认知,我们也不能否定学生的母语认知对他们的汉语学习有着一定的影响,而且可以说几乎绝大多数的汉语学习者在学习汉语后,仍居留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进行与中国人在商业、文化、经济、学术等的各项交际的活动。加之对外汉语教学不只限于中国本土的汉语教学,也包括在学习者母语国进行的汉语教学,因此,考虑学习者的表达需要也就显得特别地重要。

本书主要是在作者的博士论文《“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研究》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试着从人类理解和表达的认知层面和交际的本质以及生存的需要出发,提出“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的理念和研究方向,以动态更新的大规模汉语和韩语真实语料库为主要的研究材料,不但考虑汉语学习者在汉语理解上的需要,也考虑他们用汉语表达时的需要,企图将静态式、被动式的教学带向动态式、主动式的教学。因为这不但符合教育学的原则,也符合时代的需求。本书还主张:一个具有针对性的“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必须是在中、外的对外汉语教学专家与学者的共同参与下研制出来的,不能只限于中国的专家和学者单方面的研究。

推广和倡导“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是本书书写的最主要目的,我们以为唯有展开“国别化”的教学研究才能有效地进行对外汉语教学,提高教学的质量和成功率。再说,在对外汉语教学的实践中,我们可以确定一件事,那就是对韩国汉语学习者的汉语教学与对美国、法国、德国、泰国、阿拉伯等等的汉语教学有很大的不同,教学出现的难易点也

不完全一样,比如说对欧美学生的汉语教学必须强调汉字的教学,必须是一笔一画地教,因为每一个汉字对他们来说就是一幅图画、一个记忆工程,然而对韩国、日本学生的汉语教学,就不必花太大的力气去教汉字,因为汉字词在他们语言结构里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加之汉字的教学在韩国和日本一直被重视,大部分的学生从小学就开始学习写汉字、认汉字,汉字对他们来说不是很陌生。语法方面,教学实践证明韩国学生对“把”字句的学习与掌握要比欧美学生来得容易;语音方面,由于韩国的发音系统中没有“f”、“v”、“r”等音,因此,对韩国学生来说要正确地发出这些音来就存在很大的困难,然而对欧美学生来说问题就不太大;对音调的掌握也是一样,韩国学生和欧美学生也都各自显示出在音调掌握上的不同难点;词汇和阅读方面,韩国学生因为对汉字已有认知的缘故要比欧美学生占优势。这种种现象说明要有效地发展对外汉语教学,“国别化”的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是势在必行的,不但符合语言教学的理论,也与语言交际的实质目标基本一致。其实很早王力、朱德熙、陆俭明、吕叔湘、王还、胡明扬等语言学家和教育家在不同的场合都说过类似这样的话:怎样教外国人学汉语,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使他们学得更快更好,这类的教学研究应该更细致些,分门别类地研究,如教日本人怎么教,教英国、美国人怎么教等等;对外国人的汉语教学特别能发现汉语研究的不足,开拓我们汉语的研究点。不可否认,今天的对外汉语教学的研究在教学实践中显出了它的局限性,“国别化”的对外汉语教学和研究具有一般对外汉语教学研究所没有的新视角,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是针对性、实用性和系统性的具体实现,能突破教学实践中的局限性。

本书中将“国别化”(country-specific)界定为“针对不同的国家而实行不同/差别的汉语的教学”,由于大多数的国家都是由一个主要民族所建立,都有它共同的民族语言,所以,将国家作为一个研究的整体单位在研究和操作上都较为方便。假若一个国家内有不同的民族,使用不同的民族语言,那么将进一步细化对这个国家的研究,以这个国家的各民族为研究对象,建构出一套适合他们的汉语教学大纲。因此,所谓“国别化的对外汉语教学”,简单地说,就是“基于不同国家的不同情况而进行的汉语教学。”我们以为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地满足对外汉语教学的针对性教学原则,也才能为“个性化”的对外汉语教学打下基础。

对外汉语教学中所谓的“词”应该是一个严格定义的“词”,还是一个包含“语”、“词组”的广义的“词”?这个问题很少受到对外汉语教学学者和教师们的关心,从对外汉语教学成为一门学科后,迄今也没有被界定过。本书尝试综合语言学、认知科学、社会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的观点对它进行界定。我们认为以实用为主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和以学术研究为主的语言学中严格定义的“词”是两个不甚相同的概念,对外汉语教学中所谓的“词”,也就是所谓的“教学词”,不应该是语言学中严格语法定义的“词”,而是一个结合紧密、符合人类语感,能说、能理解的语义理解和表达的单位;也是符合人类记忆节约原则的一个认知的“组块”单位。换言之,它是一个广义的词。其实《HSK 大纲》8,822 四

级词表里收录的就有不少的“语”。再说,汉语的词、词组、短语甚至句子之间的界限还不是很明晰,加上大量的新词、新语、新用法的出现,也带来了不小的混乱,使得词语间的界限划分变得越来越困难。另外,认知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脑在接收语音流和符号序列的时候,倾向于“整块”处理,譬如人在阅读和听人说话的时候,并不是一个单字一个单字地读和听,有的时候也不是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读和听,而是“一块一块”地读和听。这个“一块一块”的“语”的单位,我们以为只要是符合人类的认知和语感习惯,应该包含在对外汉语教学中“词”的范畴里。因此,本书中试着将对外汉语的教学词界定为:语言中能听或用来造句的单位,它一般具有相对固定的语音形式,是一个在现实交际中用来理解和表达,具有“意义充分性”(significant adequacy)和“流畅充分性”(fluent adequacy)的语言单位。所谓“意义充分性”是指是内部结合紧密,意义明确且已经凝固为一个整体,不能随意切分的语言单位;所谓“流畅充分性”是指在语音形式上凝固性强,且为人类认知记忆范围内整体输入和输出的一个不大不小的组块单位,具有所有“词”和“词汇”的属性,但包含层面却更广泛。界定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教学词”,不仅是完善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且必须的工作,而且在汉语的教学和学习中也客观地存在这么一个基本的单位,而且也需要这么一个单位。

研究中所使用的语料来源分别是:北京语言大学应用语言学研究所的“动态流通语料库”;韩国国立国语研究院的“常用韩国语语料库”;中国国家汉办的《HSK 大纲》。在实际的语料处理和筛选过程中,组织了中国和韩国的对韩汉语教学专家的参与,采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综合集成的研究方法。整个词表制定的逻辑流程,主要是以“模块”的建构方法操作,以达到简化词表更新的程序,增强词表的更新能力。考虑词表的更新,主要是因为当我们走进语言当中,从语言社会性的微观视角来考虑语言,语言这个变数同社会这个变数之间具有“互变”(共变)的关系。换言之,它与社会是互相作用、互相变化、互相影响,也互相制约的。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与变化,语言也就随着社会不断地发展与变化,因此,作为语言标志的词汇也就应该定时地更新,以反映社会的发展。为了考虑研究的质性,在我们的研究中还设计了三项问卷调查,调查结果作为筛选词语的一个主要参照指标。研究结果显示:汉语语料方面共收词 8,686 个,韩语语料方面共收词 1,020 个,中国流行语方面共收词 35 个,韩国特色、流行和补充词方面共收词 296 个,总共收词 10,037 个。

本书共分为基础篇、理论篇、研究方法篇和应用篇四个篇目。第 1 章基础篇主要说明选题的背景和目前有关此研究课题发展的现况,共分为 5 节,分别是: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现状,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任务和目的,“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的界定,国内外词表研究的发展和现状,什么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

第 2 章理论篇综述了有关此研究论题的相关理论基础,这些理论为人是如何进行词汇的学习提供了说明与解释。Thomas & Collier 的“The Prism Model”(四角棱柱模式)

指出了四个影响语言习得要素间的关系。这四个因素分别为:社会文化的进展(sociocultural processes)、语言上的发展(linguistic development)、学术表现的发展(academic development)和认知的发展(cognitive development)。(Thomas & Collier in Ovando & Collier, 1998, p. 89)我们在他们的基础上,试着从和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拟定有着密切相关的一些交叉学科出发阐述它赖以支撑的理论基础,他们分别是认知科学、第二语言词汇习得、第二语言教育学、社会语言学和语料库语言学。

第3章~第7章研究方法篇主要展开了整个研究的过程、研究的成果、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意欲进行的工作,其中研究的过程包括了“词”的界定研究、总体建构的逻辑模块、研究方法流程、前期调查研究等节目。整个的研究程序可以说展现出了制定“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的一套方法论。应用篇则论及了和“国别化”(韩国)对外汉语教学相关的一些应用研究,包括了《基于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别化”双语〈学习辞典〉编撰的构思:以韩国为例》和《韩·中同形异义汉字合成词的对比研究》两篇论文。

本书作为“国别化”(“本土化”)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一个具体实践,希望能将对外汉语教学从粗放型的量化教学进一步推向更有针对性的精准型量化教学,为学习者“怎么学”提供实质性的指导,也希冀对对外汉语教学的理论建设和教学研究起到一定的助益作用,对人类的共同认知和语言获得的研究提供些许的帮助,更希望能为对外汉语教学的“国别化”动态词汇平台建设打下一定的基础。由于笔者在学识、智力、心力上的有限,不够谨慎及疏漏之处,敬请读者谅解并给予批评与指正。

目 录

序一	陆俭明 1
序二	张 普 3
Abstract	7
前 言	11

基础篇

第一章 “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的背景和发展现状	3
1.1 本研究提出的背景	3
1.1.1 “对外汉语教学”的发展现状	3
1.1.2 “对外汉语教学”模式的变化	5
1.1.3 “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学任务和目的	6
1.1.4 “国别化”的界定	7
1.1.5 “国别化”的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性	7
1.1.6 “词汇教学”与“对外汉语教学”	8
1.1.7 “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的制定与“对外汉语教学”	9
1.2 国内外词表研究的发展与现状	10
1.2.1 国内词表研究的发展与现状	10
1.2.2 国外词表研究的发展与现状	11
1.3 界定对外汉语教学中“词”的意义	13
1.4 “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用词表制定依据、基本原则和前提假设	14
1.4.1 词表制定的依据	14
1.4.2 词表制定的基本原则	15
1.4.3 词表制定的前提假设	15
1.5 本研究的目标	16